学术专论

此岸与彼岸之间*

——由《遐迩贯珍》看 19 世纪中叶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

李智君

[摘要] 19 世纪中叶，海洋是一个权力的"公共地"，沿海地区则是一个典型的"边际地带"。此岸，清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士绅，在边际地带的控制力有大有小，从而导致洋人和地方会党在通商口岸的势力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权力之间角逐所造成的民众移民海外的内推力也就有大有小。在公共地海洋上，些许的秩序来自口岸城市权力的辐射。辐射区之外，移民的命运就由海盗、奸商、台风等来决定了。彼岸，又是一个边际地带，不同的是踏上彼岸的中国民众变成了客居者。作为公民，国家这把伞，不再为他们遮风挡雨。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发行于1853 年8 月至1856 年5 月的《遐迩贯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本文把《遐迩贯珍》的每月新闻信息——"近日杂报"，连缀成一个空间过程和历史事件，即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中国民众海上生活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首先从国家制度来看，海外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弃民，自然对其"无可悯惜"。其次，客居华人所采用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与西方市民法制社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制度性冲突。再次，客居的中国民众，因性别比例失衡，不仅自己无法在海外落地生根，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使华洋之间严重对立。长期存在的西方种族主义和中西宗教差异，进一步激化了华洋之间的冲突。这种隔阂与冲突，最终导致中国民众没有在大洋彼岸获得相应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

[关键词] 通商口岸　海上生活　政治地理

[中图分类号] K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587 (2009) - 04- 0072- 17

Between Two Shores: The L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as Depicted in *Chinese Serial* (1853—1856)

During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ocean was an influential "commons," but the coast was a typical "marginal zon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Q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ts local representatives, the gentry, in the marginal zone lead to the difference in power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s in the treaty port. The competition for power provided the impetus for migration. In the ocean "commons," a limited order radiated outward from the port cities, but outside the limited zone of order, pirates, profiteers and typhoon determined the fate of migrants. Setting foot on foreign lands, Chinese people were strangers. They were once again in a marginal zone unprotected by the "umbrella" of citizenship. These arduous journeys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Chinese Serial*, which was published between August 1853 and May 1856. This article gleans a mélange of monthly news across space and time from the *Chinese Serial* to reconstruct the lives of Chinese people in foreign countries. Socially, the difficult liv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rooted in their perception as people mercilessly discard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Secondly, the basic social organ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tong*, was the root of harsh, regular clashe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Western legal

---

[收稿日期] 2009- 04- 20

[作者简介] 李智君 (1968—)，男，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厦门 361005

systems. Thirdly, the imbalance in sex ratio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ir rootlessness in alien lands, but also caused many social problems. Longstanding racism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ers and Chinese also intensified the clash. These cultural and social gulfs and clashes left Chinese immigrants with no space or discursive power in foreign lands.

历史上“人类之俊秀、物产之蕃庶、可置列邦上等之伍、久已超迈侪伦”的中国，至19世纪中叶，在西方传教士看来，与列邦相比已是“降格以从”。“其致此之由，总缘中国迩年，与列邦不通闻问。昔年列邦人于中土，随意游骋，近年阻其往来，即偶有交接，每受中国人欺侮，惟准五港通商而已。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见授，尔有所闻，无从剖析相传”。故拯救颓势之道是中国“准与外国交道相通”。[①]然而，此时的中国，却缺乏有传播能力的媒体来承担这一重任。

> 中华不似泰西诸国，恒无分送日报，又无置邮递信，更无迅速驰骤。平时透达信息，多由耳食传闻，或由书筒寄递。素有携带书函，以资营生，其日行至速，亦不逾一百二十里。故此土相距辽远之事，颇难早得确耗，除系要事，关系官宪，应奏朝廷者。毕竟入于京抄，众目共睹，列后所叙各情，间亦得于此。但所叙仅撮其时日及地方，因其铺张各说，原难凭信。且其所载专指军兴之事，亦未精详，尤属迂阔。故除时地之外，足征不讹者，无几。[②]

1853年9月在香港创刊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就想弥补这一缺憾。因此，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 1796—1857)在论及《遐迩贯珍》办刊的目的时说：“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其内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③]

关于《遐迩贯珍》，日本关西大学的松浦章、内田　市、沈国威，复旦大学的周振鹤等先生作过系统的研究。其中松浦章教授就有题为《〈遐迩贯珍〉所描述的近代东亚世界》论文发表。该文章侧重于文献学的研究，提纲性地阐述了《遐迩贯珍》史料的重要性：“《遐迩贯珍》刊行之后，第1期新闻揭以‘近日各报’为题，第2期以后以‘近日杂报’为题，持续至停刊。本栏及时传递东亚及世界的各种‘新闻’。《遐迩贯珍》刊行时间不满三年，但在‘近日杂报’栏中揭载了很多反应近代东亚世界变化状况的重要消息。”[④]可见，《遐迩贯珍》作为媒体，交通中西的目的未必达到，但却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生活的许多方面。

本文尝试运用《遐迩贯珍》的每月新闻信息——“近日杂报”，叙述19世纪中叶，在多元政治格局下，中国民众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此岸到东南亚、大洋洲和美洲的彼岸之间飘荡的海上生活，清政府、西方势力和民间基层社会组织等对身处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中国民众海上生活的影响，并探讨中国民众没有在大洋彼岸获得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的制度原因。

一、此岸：多元政治格局下的动荡时世

海上航行，是由航行出发的此岸、航行到达的彼岸以及漫长的海洋航线组成。1853年至1856年间，《遐迩贯珍》记述的此岸中国口岸城市主要有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和上海。这些中国沿海城市，规模大小不一，民生状态各异。清政府、西方势力和民间基层社会组织之间，在这些城市中进行着程度不等的权力角逐，社会动荡不安。由动荡形成的强大推力，使许多中国民众在沿海各港口，登上了由此岸到达彼岸的航船。

1. 上海：中英吴淞之战后，英军于1841年6月19日占领上海。施美夫(George Smith)记述这场战争给上海人与英国人之间造成的影响时说：

> 在最近灾难性的战争中，上海受损甚微。上海为英军攻占，但毁坏的财产不多，伤亡有限。大多数损失是当地暴民恣意抢劫所造成的。因此，在那方面，上海

人对英国人没有太多的憎恨或不满情绪。最初，人民偶尔会用鬼子这一丑化词来称呼外国人。但中国当局迅即贴出公告，禁止使用该词，若使用类似的攻击性词语将受到惩处。[⑤]

其实中英吴淞一战，只是英国人在上海顺风顺水立足的一个开端。1848 年 3 月，英国人又借传教士麦都思在青浦被山东人殴打一事，即青浦教案，大肆要挟，获利甚多。[⑥]上海当局对洋人忍让的惯性，在小刀会占据上海之时，转变为主权丧失的事件：

> 上海邑处边 ，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良莠不齐，居恒逐利构怨，树党相仇杀。近则小刀会兴焉，会中复判七党，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合之数千人，居无恒产，出无执业，攘夺抢掳，其资生之具，莫能问所从来。[⑦]

开放上海口岸，造成大量的水手和棉农织户失业，鸦片泛滥，社会动荡，地方会党乘机起事。会党蜂起之时，大多数在上海的英、美侨民，因商业利害和宗教信仰关系，都祝愿叛乱成功。正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言：“作为旧国都的南京落入任何起义者之手，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然而当人们得知这些起义者是基督徒时——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帝国，而是对中国的异教主义发动圣战——他们便觉得激动不已。商人们开始盘算这一胜利对于商业的影响；传教士们则讨论起它对于传播基督教信仰可能会产生的意义。”[⑧]因此在上海的英语集团，[⑨]上下其手，暗中支持小刀会：

> 上海来信云，县城现未收复。官军于城之西北，设立三寨，计有士旅八千名，而城中人不知其数几何。第能操戈出阵者总不逾千人而已。城中居民，禁止 发，犯者获而笞责之，但留辫发以绾髻。其头目居常红衣红帽，坐厅事行刑，则用明装冠服。观此情景，官军 怯既甚，诚恐不能奏功克复，计或他时城中匮乏银钱，无以购物度活，则弃空郭如遗，斯为官军复得耳。至薪米火食，其来源饶裕，因城外设有市肆，晨夕所需，于女墙上缒篮以交易，不忧其缺也。[⑩]

洋人暗中襄助会党，官府可以装作看不见，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上海有人出一诉贴，哀悯目下荼毒情形。并云外国人原属耶稣教，其道恒爱人如己，举世睦好，不能无故两相残害，岂合置备军机凶器，潜货与敌人，致令资以攻杀，益增干戈之惨，而助残戮之祸，殊可嗟悼而痛惜也”。[⑪]相反对于外国人资助政府军的行为，则严加禁止：“上海前月因有外国人卖火药等物，与军营为用。英领事官知之，大以为不合，出示严禁，略言两军对垒之际，不宜偏有所资助，自示之后，有复蹈故辙者，严办毋贷。”[⑫]

英、美在支持小刀会的同时，还乘乱打压地方政府、攫取财富和权力。其一，英、美乘小刀会捣毁了上海海关之机，控制了上海海关。[⑬]其二，英美借机保护商人，建立自己的军队，与政府军对打。洋人以炮击事件为契机，成立了自己的职业军队——上海义勇队，后演变为万国商团，使租界地实质上变成洋人的“城邦”。其三，华洋二分的城市聚落格局，在战争期间转变为华洋杂居的新格局。[⑭]

各方势力混战，上海普通民众损失惨重：“其城门外滨河一带，屋宇千五百余间，今已遭焚毁，居民荼毒之苦，惨不可言。既遭蹂躏，而官兵纪律荡然，散游城厢乡落，欺扰良善，攘夺资财，淫其妇而杀其夫，奸其女而戕其族，种种惨祸，缕述难详，时事艰难，一至此极。”[⑮]本土贸易和洋货生意盛衰之势因之发生了逆转：

> 上海洋货生意甚盛，洋船约五十号停泊海面，中国经纪客商，乘轿往来于番人驻扎之处，纷纭不绝，体貌丰肥，衣冠华美，日厌膏梁之味。而城中之人，多有菜色也。本土贸易，多因兵戈扰乱，迁往宁波、镇海两城，是以贸易艚船，云泊彼所。[⑯]

战前上海县城约有 30 万人，战后仅存二三万人。当然绝大部分是逃难至宁波、镇海，还有许多绕道香港去旧金山，但死亡的也不少。[⑰]

可见，开埠后上海是清政府和地方士绅阶层力量极为薄弱的地方，士绅阶层缺失，是因

为他们在上海发财，在苏州消费，因为“苏州是古典文学、美食与时尚的大都会，享有中国牛津之美誉。苏州亦是产生影响的中心，当地哲学的光芒辐射到中国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民众”。[18]政府力量薄弱，是因为上海是边 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党入城，洋人乘机攫取财富和权力，那么，普通民众就只有亡命天涯的份了。

2. 福州：如果说上海、厦门是标准的边际社会，即边 ，福州则不然。福州作为省会城市对外开放，朝野内外是十分谨慎的，因此当西方列强提出开放福州口岸时，道光帝就称“福州地方万不可予”，[19]原因是“闽省各府均产茶叶，武夷山为最，岁可出数千万金。福州省会环山，五虎天堑，足资捍御。若听该夷往来，据险而权大利，势将不可复遏”。[20]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势力发展至华南和华中地区，福州对外贸易封闭的局面被打破。美、英商人乘机介入茶叶贸易，开辟了由武夷山沿闽江顺流而下至福州的贸易航线，福州对外茶叶贸易由此盛旺异常：

> 福州地方安靖，茶叶贸易，盛旺异常。各国商船，多至彼交易，且有预定来岁之茶者。近得一信，福州城内，地方官出示，准身家殷实人，设立公茶行一所，承充总茶商。[21]

> 福州地方，年来外国船只，前往贸易者甚多，生意情形极有腾茂起色。[22]

尽管外商云集，贸易发达，但福州的社会秩序，依然被地方当局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 十一月十三日，福州来信云，数月来，因地方多故，致数家大银行，关闭歇业，而小经纪挑贩贫民，多受苦累，盗贼纷乘窃发，兴花、延平等处，频遭滋扰。该省制府若非念切 ，刻意整顿，且能办理勤敏，令在必行者，罔克有济……现在地方已获安贴如故，延平府亦复静谧，刻下总宪印务，已移交该省将军有风兼署。福州五虎门外洋面不靖，海盗甚伙，频为官兵捕办。[23]

可见，无论是平息金融风潮，[24]还是捕办闽江口的海盗，福州地方政府的运作都显得相当的迅捷有效。

由于贸易往来，中英之间的仇恨和对立局面也有缓和的迹象，由1854年福州地方政府救助和接待英国人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 有英划艇，由上海驶往福州，至半途，被海盗掠劫，船主搭客等，皆脱身登岸，投访地方官衙门，该处官宪，饰备夫轿，赠馈盘费，将英人等送至福州府，殊堪感谢。[25]

> 七月廿一日，英公使包，于上海回棹时，暂泊福州。入城进节署会晤闽浙总督王，启门声炮，礼仪极周，总宪旋诣该处英领事官署回拜。[26]

要言之，在清政府的国家力量和地方士绅协力同心的口岸——福州，西方势力很难立足，即便后来中西茶叶贸易茂盛，但主权仍然把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这个唯一没有经过战火洗礼的口岸城市，老百姓生活的稳定因此有了保障，所以从这里踏上海路的人比同在一省的厦门要少很多。

3. 厦门：厦门是闽南人下南洋的离岸城市之一。1846年，“厦门市的人口估计只有15万，拥有的商船数目却是重要的省会城市福州的三倍。人们大量的移民婆罗洲（加里曼丹岛）、暹罗、新加坡、马六甲、巴达维亚、三保垄以及爪哇的其它地方，想要靠贸易发财，然后衣锦还乡”。[27]移民海外寻求发展，是明清时期厦门人生活的常态。

1841年8月27日，英军侵入厦门后，“侵占石寨及各衙署，肆行拆烧，抢掳资财，奸淫妇女，焚毁庙宇”。[28]孙衣言《哀厦门》诗云：

> 红毛昨夜屠厦门，传闻杀戮搜鸡豚。
> 恶风十日火不灭，黑夷歌舞街市喧。
> 提督自言捕小盗，远隔洲岛安能援？
> 风帆径去幸无事，天阴鬼哭遗空村。[29]

“黑夷歌舞街市喧”是英国的印度雇佣兵恶劣行径的写照。施美夫游记云：“英军在城里没有抢到什么东西，因为厦门只不过是个附近更重要城市的外港，当地商人亦不闻有多少财产。印度士兵干了许多过分的事。即使到现在，厦门的丈夫们、父亲们都会义愤填膺地诉说对他们家庭所造的孽。印度士兵的行为给这

一事件蒙上了耻辱。”[30]

1853 年，地方会党的出现，加大了厦门人出洋的规模。5 月 18 日，“福建厦门为天地会人攻夺。其党本无大志，只因挟官司私刑之恨，欲报复旧仇。据云与别股尚无往还，惟已遣人北诣江宁，欲投其党，是否允受，未可预决。但福州有驻防旗兵如许，谅江宁城中人，必乐闻此说也”。[31]光绪《马巷厅志》亦载：

> 咸丰三年，乃有同安石兜社黄得美之乱。初，海澄县民江源与其弟发以无赖武断乡曲，源归自外洋，购有洋小刀数百柄，遍赠同类，结为小刀会。其膂力绝人者倍其刀，故名小刀会。黄得美有田在龙溪浒茂洲，常受强佃抗租之苦，越境控追，官不为直，乃约族叔黄位同入会以凌佃，繇是江党渐盛。海澄知县汪世清闻之，捕江源、江发置之法。黄得美愤甚，乃与位谋作乱，为源、发复仇。[32]

这场复仇战不仅有会党与政府军之间的战争，同时会党内部也不平静。《遐迩贯珍》1853 年第 1 号载：“厦门现尚被天地会党据守，官兵于邻近聚集扎营，其头目首次二人，近因微嫌不睦，各帅其党相斗，互有杀伤。”至 1853 年 11 月 22 日，即农历 10 月 11 日，厦门城被清军攻克：

> 厦门于本月初十日，为官兵收复。城中人先数日自顾势蹙难守，其头目预将眷属等，载逃他方。是日黎明，官兵用云梯登城，其党众遂弃城由南门奔窜，至海滨，船艇皆无，飞渡无术，官兵随后追蹑，铳轰刀砍矛刺，骸 载途，有被戕倒毙者，有缚其一手一足，掷于海者，有赴水逃生而沉溺者，断头折足，剐者醢者，被剿残酷之状，笔难罄书，约千有二百余人。时英国领事官，目睹其惨，心殊恻然，况其中非尽党徒旧侣，多有城内被胁充役贫民及良善安业者，受此惨毒，因协同该处驻守水师官，督兵救拔，力劝官兵无过于惨戮，得脱生者四百余人，中有受创重剧者，带回交官医调治。现在城中居民欣忭，重葺旧业，铺户生理，亦有开张者矣。[33]

战败后，大多数会员逃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台湾和香港，还有人在逃难途中葬身鱼腹：

> 厦门有十二月二十日来信云，地方静谧，惟海面盗匪滋多。前城中逃脱会匪头目一名，现查得已抵息力（即新加坡）。彼时偷驶，因船中人多，伙食不敷，沿途抛弃数人于海，始得抵其处。[34]
>
> 风闻昨年占据厦门之叛党，有一队往台湾，攻取一城，劫掠财物甚多，惟近日多被官军擒杀者。另有一队共计五十八人，十月十一日，于本港为差役连船并获，因有福建商人，曾被他劫掠，知所失之物尚在其船，故诣差馆委差捕之。十一月初一日晚间，役宪闻报，有数百贼匪，身藏军器，聚集上湾，即领差捕捉，获得五十一人，闻说此贼亦属厦门余党，欲即攻九龙云。[35]

由于清政府、英国人和地方会党在厦门的交替控制，使本来就已形成下南洋求生习惯的厦门人更多了一份内推力。据戴一峰先生考证，1841 年至 1875 年间，经厦门口岸出国人数达 49.9 万人。[36]

4. 广州：“若天下之海关，必推广东为第一矣。天下之税饷，每年共计三千三百万有余两，是以粤之税为十分之一矣。”[37]就是这样一个贸易发达的口岸城市，鸦片战争后，却成为“对外国人怀着极为憎恶的感情”[38]的城市。施美夫对这种仇视的印象极为深刻：“我们遇到的欧洲人，没有一个在最近两年敢冒险出城。例外的只有一个海军上尉，他出城不久即遭遇枪林弹雨，也不得不逃命，身上还伤痕累累。仇洋的暴力行为，长久以来得到鼓励，当局现在也许无力控制，也许还是始作俑者。”[39]丁韪良回忆 1850 年到达广州时说：“当我们上岸时，有一大群人围着我们喊：‘番鬼，番鬼！杀头，杀头！’……他们看上去就如食人生番一般野蛮和凶狠。”[40]

1853 年 10 月，何六在广州府以东的东莞起事：“东莞县铁岗地方，有会党二千余人举事，地方被害极惨，督抚宪现已派饬员弁，分路往剿。”[41]在广州府以西，三合会的 7 千名会员，在陈开的带领下，于 1854 年 7 月 4 日占领佛山。“佛山地方，有会匪聚众起事，党羽

近万人，据衙署、戕官拒捕，勒富室铺户，交银打单，阖镇骚然，闭户歇业，士民妇稚，纷纷迁徙。省中大吏派调员弁，带兵勇前往剿办，开炮轰击，亦有歼获。闻匪等乌合起事，炮药未备，然近日亦开炉铸造炮位，筑建泥炮台，以御官军，其附近一带乡村，如西南芦包均多不靖”。[42]1854年农历6月22日，会党兵分三路围攻广州城。

会党所到之处，为害甚巨，“省城之西面一路，屡遭佛山贼匪之害，贼自据佛后，苛敛居民，复火房铺，数日不熄，所毁民房铺店，三分去一，人民死者约有一千有余，合镇罹其残酷，殊属残不忍言。夫佛镇为四方辐辏之区，货物丰盈之地，一旦皆成灰烬，焦土堪怜，君子仁人，有不握腕而唏嘘者乎”。[43]有人云，距粤省不远地方，有数处匪徒党众，肆行霸掠，残暴不堪。[44]

面对四起的会党，一方面“粤东省垣，街坊众户，佥捐银九十万两，为经费之用，团练丁壮，保护地方”，[45]士绅也积极参政议政。[46]另一方面，“省垣各富室，畏乱先徙，多挈眷附本港常行载运贸易之火轮船，赴本港及澳门寄寓。有一火船载至六百余人者，多妇女幼稚，亦有用中土快艇载人，以缆系于火船以行者，各船价水脚涌贵，闻一中土客赁一火船载眷，价至一千二百余元”。[47]“有人云，粤省会垣士民眷属迁徙者，有数家因欲回城，值戎马梗途，进退维谷，竟有数妇人自尽者，是可悯也”。[48]

“广东贼盗无时不有，无地不有，而莫甚于今日”，[49]会党四起，使这个华南最富庶的城市，沦落为战场，民众大量逃亡香港和澳门。

5. 香港：周边口岸城市的动荡，导致大量士绅入香港避祸。这些移民的到来，给香港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还给香港输入了大量的社会精英。关于香港人口状况，《遐迩贯珍·香港纪略》云：“此土初归英国时，居民稀少，多属随趁捕鱼之人，设铺种地，鱼汛既过，即复随而他徙。总计彼时港中居民，不逾二千，今则不下三万二千矣。此外尚有诸多英吉利等国人，并天竺国等处人民，俱不在此数。”[50]1841年5月15日香港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该岛有居民4350人，此外还有2000渔民住在船上，800名主要是移民的商人住在市场，还有来自九龙的300名劳工，即当时香港中国人约有7500人。[51]1844年增至1.9万人，至1853年时约有3.2人。最初移民香港的内地人员素质并不高。“中国的社会渣滓，成群结队地涌入这个不列颠殖民地，或是梦想发财，或是图谋抢劫。虽然有几个颇为殷实的店铺老板开始来这个殖民地定居，但新来者中，绝大多数是地位低下，人品卑劣。城里的中国人口主要是佣工、苦力、石匠和打零工的泥水匠，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住在船上……简而言之，目前来香港的不是流民就是劫匪，吸引其它人的希望十分渺茫。那些梦想发财之人或是图谋抢劫之徒，一旦希望破灭，便会毫不犹豫地徙迁他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方面“在广州，具有身份地位之人，极其不愿意与香港有任何瓜葛，以免引起公愤。中国爱国人士心中的这种偏见，不能不谓之为自然，因为香港是用刀剑强行割走的。中国的统治者应当承担最大的公愤，而香港则成了他们骄傲的心目中一颗永久的眼中钉。在公众的这种感情之下，律法的威慑和约束成了强有力的工具，遏制有身份地位的人移居外国殖民地。”另一方面，“以为有钱的中国人来香港，必须把一大笔财产和许多家庭成员留在大陆，作为当局手中的抵押和人质。这样，他在香港居住期间，仍然在清朝官员的掌控之下，跟在中国本土上居住没有多少差别。处于这种实质性的威胁制度之下，不难看出，我们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吸引中上流阶层的人来香港，只是方便了清政府驱逐不想要的人。”因此香港早期移民“几乎都是文盲，不识字”。[52]而且来香港的中国人通常是未婚男子，或是把家眷留在大陆，打完几个月的工后，带着积蓄回归故里。[53]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犯罪率极高，“一度成为海盗、窃贼的乐土”。[54]

这种情况，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日来港者，冠冕之彦，接踵日增”。[55]“粤稽道光戊申年，唐人居于香港者，有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口，至咸丰元年，数已加至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三口，讵料旧年约增至五万五千人之多，究其原故有二：一因近来粤东内地扰乱，省垣震惊，唐人以本港为乐

土，故挈眷源源而来。一因本港官清法善，到处传扬，唐人闻风，悉来营业，故近悦远来，如鱼龙之趋大壑焉”。[56]因此，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称这次移民潮是“香港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折点”。[57]据《遐迩贯珍·香港客岁户口册》计算[58]，1854年的香港人口男女性别比为2.67比1，已经达到19世纪后期的平均状况，即2.7比1，足见这次移民潮对香港社会影响之大。

不仅有钱人避难香港，大量的中国民众也以香港、澳门为离岸港口，横穿大洋，四出佣工。

二、漂洋：艰难地穿越海墙

19世纪中叶，中国民众出国佣工的目的地，已由南洋延伸至新大陆，时人叹曰：“寰瀛四境，无处无中土人。”有关中国民众在海上与世界各国交通的状况，以及在各地佣工的种类，《遐迩贯珍》载：

> 十一月十四日有花旗国船二只，由金山抵港，载回中土人五百六十一名，有携带资财返里者，有暂返乡井度岁，仍图前往金山者。另有别国船由彼抵港，载有中土多人，从息力、葛剌巴、亚士低里亚三地回者亦不少。其由息力、葛剌巴者，系自昔年以来，贸迁生聚于斯，实繁有徒，而前赴加尔各得、孟买两地者亦有之。惟金山及亚士低里亚均为产金之地，离乡井而越境至彼者，乃出于近年。但事虽起于近年，而人数至盈万累亿之多。越境之人，将来日见其增，因各处皆需营建工作，而人力尚缺。种田，砌路，筑室，造舟，其费不赀，皆已具备，但乏人力操作而已。现际各国驰驶往来之道，皆臻便捷，拥工者恒如货物流转，择利是趋，自兹不远。余思中土人，多有迁赴花旗国南境，及西印度海岛，种植棉花、甘蔗、加非等物，况现值南北亚美理驾地，其居中咽喉如茎处，名巴拿马，需铸造火轮车路，及开挑运河以通接太平洋、大西洋两海，免似从前往返纡回，故兴此大工，需人尤多。亚士低里亚地，因近时探出金矿，众民多诣采金，致各牧场内工作稀少，新西兰之地俱然。想能坐致中土人，趋而补助之也。毕竟寰瀛四境，无处无中土人。似此兆亿侪流，越境与别邦人士往来接洽，不得不于中土情形风气，稍有变化，自有变而至于美者，可无他虞耳。[59]

东南亚和南亚是中国民众下南洋的传统目的地，清中叶以后，“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葛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60]美洲和大洋洲是中国民众新开辟的谋生目的地。在这里华人主要以采金为业，还有一部分人在中美洲热带种植园种植棉花、甘蔗、咖啡等经济作物，或在巴拿马开凿运河。

由中国沿海到达美洲和大洋洲的航线，都属于远洋航线，船舶在海上滞留的时间很长，海难频发，使中国民众的海上航行异常艰难，如同穿越巨浪滔天的“海墙”，以至于有的旅客在海上漂荡大半年，竟然又回到起点：

> 前八九月，有船一只名西鹤士者，运载搭客，由黄埔扬帆，前往旧金山加拉宽，不料其船自开行始，至二百零十日之久，犹未能抵埠，竟于十月十一日，回此港口。泊后一刻，即往黄埔。闻搭客中遭死之惨者数人，历艰险者亦复不鲜。夫搭客获生还之庆者，犹得复得其水脚，而数月之间，身在茫茫洋海，惊受风波，竟不得到其意中之地，其痛可胜道哉。[61]

海上常见的事故有台风、疾病和海盗等。

(1) 台风

西北太平洋海域是全球热带气旋活动最频繁的海域，因此台风就成为过往船只不得不面对的自然灾害：

> 五月二十三日，有三枝桅货船，名黎地伊弗伦，由港开行，载有中土二百四十一人。六月十七日，驶抵台湾东北洋面，猝遇风暴，遂于该处之太平山岛搁礁。全船覆没，人货俱空，仅余伙长一名。中土人二十四名，泅泊山岛得免。船经英水师提宪，闻信，派火轮船至彼拯载其人至厦门，现已陆续回港矣。[62]

> 十月十六日，火船简顿牵花旗船迦士里入此港口，其船已经破坏，此船亦由旧

金山回者，船上搭客甚繁，特回故土。九月三十日，忽遇狂风，将船桅尽皆摧折，其时浪盖船面，继入舱里，溺死十六人，船主之器皿尽入水中，而船主及水手，犹勉力行事于危苦之际，故十四日半，其船驶行四千五百里许，恰遇火船，牵之入港。[63]

台风频发是天灾，客船破损和超载是人祸，两相一旦耦合，受害的是无辜的乘客。所以香港经常表彰奖励那些患难相救者：

> 正月初间，有洋船一只，正在海外驶行，忽值飓风顿作，将船击破，以致举船之人，尽为鲸鲵，良可慨也。幸也得水手二人，素善于游泳者奋力逃生，随水飘荡，直至新宁山下。适山上有人采樵，二人见之，乃登山乞救，惟樵人未通其音，乃以手指示迷津，引至唐薄村。值有李泽者，乃仁人君子，见此亡命之人，遂发怜悯之心，给之衣服更换，作饭食之。后共一老人名杨绶者，带二人至澳门，于十三日，搭船回港，二人既感得救之恩，乃往禀知总督。因此，总督赏银一百员，英商数人，亦赏银六十四员，共一百六十四员。[64]

在这些自然灾害的救助记载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国家救援力量严重缺失。

(2) 疾病

漂流之客在浪涌如山的海上航行，能活着到达彼岸，并寄信回家报平安，实属不易。有搭客五人寄信回港，信中说：

> 祖父、伯父、祖母、双亲大人、众位兄弟知悉，启者，小孙曾姑自别，不能膝下奉孝，任作漂流之客，分离小孙手足，失供淑水之常，夙夜自思，殊不孝矣。但自三月初四日，在港起程，行至七月初六日到埠，名尖美加。彼地方水土，此情亦合。惟在船中间，系难言，浪涌如山，亦为闲事，实不尽说，托赖上天保佑，一路平安。小孙亦中（终）日祈祷，乞上天保佑家中老少平安，小孙平生之愿也。到埠之日，有番官担保，打定合同，限五年为止，每月工银八元，倘年期限满，公司备船送至香港为定，孙也不敢逗留外国，立即回家，书不尽言。

这样的书信，无论格式或内容，都因有职业书信人执笔，所以不大能看出船中的生活，其实，就是这五人所搭乘的名为叶信的船只，航行期间，传染病暴发，死亡四十多人：

> 今年三月初四日，未士士吉发船一只名叶信，载搭客三百一十一人，离此港而往西印度英国属埠尖美加。今按火船所带新闻纸有云，其船驶行一百零四日，皆获安康，艰险历尽，讵料将抵埠十四日内，有搭客偶染一病，中国之人恒有之，惟西边国之人皆不谙此症，因此误亡者四十人。是船一百一十八日方抵埠，若开行早在二月，则得顺风相送，不须一百日则埠，庶可免船上染病之虞，而皆得安宁到彼矣。[65]

船舱拥挤，航线漫长，中途如有风浪阻隔，在海上漂荡的时间无疑要加长许多。所以跨越太平洋到达东岸的美洲，特别是金银矿极为富饶的旧金山和秘鲁航线，是传染病最容易发生的航线：

> 上年五月内有秘鲁国船雇载中土佣工人，前赴南亚美理驾之加勒澳地方佣作。驶至半途，舟中人多患病，死者二百馀人，船主亦在其内。[66]

> 四月初二日，有船名里伯达由港开行，共计八十日始抵金山。不料开行后，染疟疾而死者，有九十人之多，迨抵埠后，亦日死八九人。此事实出意外，然究其故，盖因该船开行，得出水单时，只报有二百九十七人，夫以四百九十吨之船，载二百九十七人，额固已足，查其抵埠日，竟载至四百人之多。此皆租船者，以射利为怀，故先将船抛泊近处，再搭客百余，以至有此奇惨也。[67]

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几百号人挤在狭窄的船舱内，一旦引发急性传染病，就很难控制，故船主个人的道德水准之高低，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那些漂流之客，总会遇见一些丧尽天良的船主。《遐迩贯珍•蛙为利船唐客受惨录》云：

> 九月初二日，有洋船一只，各曰蛙为

利在厦门近处山头扬帆，载有唐人四百五十名，欲往南亚麦里加秘鲁国，在彼雇工。开行数日，船主身故，于是伙长摄职，驶至小吕宋岛，欲登岸埋葬船主尸首，且欲另雇一伙长以充己职。九月望日，船至吕宋，伙长殓尸方欲埋葬，忽然唐客与伙长不知何故，互相角口，伙长即开放手枪，击毙一客。水手齐起，将众客驱落船舱，紧闭舱门。不料舱下四无窗窍，气息不通，迨伙长上岸埋尸毕，以船上之事告人，闻者大为惊愕，急往开舱，可惜死者已二百五十一人矣，其余尚多染病者。

面对这样的惨祸，传教士也禁不住大发感慨：

惨事如此，世所罕有，遐迩闻之，莫不切齿，吕宋官员已拿到该船伙长及水手辈，欲处置其罪云。窃思洋船于唐山海滨，雇客运至远处，不过惟利是图，固属可鄙，而唐官置若罔闻，亦失爱民之道。若在本港有船搭客，不拘何国之人，有司必先亲验其船，察其坚固与否，并山水食物足用与否，然后准其开行，今唐官既有父母斯民之责，竟置其事于不理，几何不视民如草芥哉。夫贫民于故土乏食，游食远方，不惜劳苦，其安分固属可嘉，但以世上昧良者多，若不为之提防，则贫民必入其圈套，为民父母者不可不垂念及之也。[68]

(3) 海盗

在中国水面上，以海盗为副业的人要比以海盗为职业的人多。海上的渔民和船民，甚至内河沿岸的农民，当他们的收入无法维持日常生活时，便立刻投身于劫掠别人财产的海盗生涯，以此来弥补生活资源的不足；当政府衰弱和维持治安力量降低时，这种水路的强盗就成为有组织的海盗，谋杀被抢劫者的事件也就随着发生了。[69]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遐迩贯珍》记载的海盗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海的广东水域和台湾海峡的福建水域。

南海广东水域的海盗案，共有 21 例。集中分布于珠江口，香港四周的伶仃洋、高栏岛、万山群岛和平海半岛周围的海域。《遐迩贯珍》载：

月内本港附近洋面，船只往来，频遭意外之变。九月二十日，担杆头有拖船一只被劫。二十三日平海洋面，亦有拖船只被掳。十月初一日，龙船湾有渔船一只被匪搜抢罄尽，初二日有渡船被劫于急水门，并船亦牵驶而去。初三日有快艇被掠于内零仃洋。初五日后门湾有渔船两只同时被劫。咫尺内洋，而出没层迭，肆其凶暴，恬不畏法如此。[70]

文中提到的担杆头、平海、龙船湾、急水门、零仃洋和后门湾，都是海盗频频出没的海域。另外，粤东海域也是海盗作案的高发区："粤东洋面近有盗贼无数，每有良民运货出口，辄被劫掠，财命两丧，殊堪悼惜。"[71]

在海盗肆虐的近海，中国师船打击海盗的记载只有一例。《遐迩贯珍》1854 年第 7 号："十一日有中国师船在九洲洋面，捕获盗舟二只。"绝大多数海盗，都是英、美师船出海巡缉："近日香港附近洋面，海盗窃发，四处劫掠，有两枝桅花旗师船出海缉捕，复有英师船一只，出海巡缉。"[72]从打击古兰（高栏?）海盗一役中，可以看出当时活跃于广东水域的海盗的规模和装备状况：

十月初五日，有知离国两枝半桅船一只，名加地拉者，扬帆往金山开行数日，不料为飓风所击，于是船主寻觅泊船处所，以避风险，遥见一市，市名古兰，遂就而泊焉。斯时见有许多小舟同集，泊后，忽有大船无数，齐来劫之。悉取其物，并执船主，船主哀求贼首带彼至澳门，俾得银以易其船。于是有贼匪二人，与之偕行，迨抵澳后，船主诡称银两不便，复给他同到香港，为差役所获。至十三晚，人将是事一察，尽得其情。因知有佛廊西一女，及唐搭客一人，为贼所擒，即发火船马利活娘娘带齐刀枪兵器，往彼处寻觅……遥见旁有大船一只，及无数小船，货物沉重，船人装饰齐整，知是贼船，遂发大炮一口，向大船桅上打去，其船亦发炮相拒，贼人惧怯，渐退至岸而奔，于是上其船寻觅，幸得二人在彼，遂

携之登火船，尽焚贼船。是时又遥见大船二只，既使小舟追之，贼弃船奔走，登其船，见有无数生口火炮等物，遂取之，乃焚其船，厥后舟人登岸，往村中寻回加地拉船之货，焚毁各处贼庄，计是日所焚毁者，不下一百屋宇，复见一村建于山顶，上村之路甚窄，仅二尺许，便欲上山擒贼，贼见人上山，即将乱石打下，被伤者甚众，然舟人奋不顾身，直抵贼巢，贼势瓦解，遂尽获其所有而返。十八日，晨早，复至一村，近古兰者，遥见其村甚为雄壮，知非四五百人不能取胜，而船只有七十人，与战无益，遂返。古兰近地之村，不能下者，惟此而已，近日提督已在日本回港，余料必发兵船往剿，谅指日可殄灭也。[73]

九月二十一日，有英御火船二只，邮船公局火船二只，花旗火船一只，并唐官船一只，同往古兰剿贼……至二十三日晨早，与贼相战，贼人大败，上岸而奔，同聚炮台，终难固守，遂杀死贼匪四十人，活擒者数人，交与唐官囚禁，是役也，焚去二村，及贼船四十七只，花旗船亦被伤一人，贼势瓦解，诸船皆即回港，惟有烟究打火船主，犹顾穷寻余党，后闻省中督抚已准贼魁投降，遂罢其役，惜哉。[74]

虽然在这次剿捕海盗的行动中，有唐官船一只参与了收尾之战，但剿捕的主力还是英美。

台湾海峡福建水域，是仅次于广东洋面的海盗高发区。《遐迩贯珍》共记录了海盗抢劫案5例，以厦门海域为集中作案区。闽南泉、漳海盗集团的形成，与福建水师的纵容脱不了干系。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云：“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返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诚以沙线海潮，非熟悉情形者不能充补。”[75]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发生的海盗事件，主要是英国人出海缉拿：

福建洋面有盗匪，经英国师船，将其拿获，俱解地方官衙门讯治正法。[76]

十月间有英商船一只，由厦门驶赴福州，于二十三日在洋面被盗匪劫掠，旋经火轮师船闻报，驰赴剿捕，残毁四十余船，而师船尚有三板小艇一只，水手五名，失落无踪。现在水师军门悬赏购访，有知该水手等下落，能报信，或妥送就近英官衙门者，获回水手一名，赏银一百元。[77]

要么就是其它过往船只搭救：“廿五日，上海火轮船驶行将近台湾，见有海盗六舟，追掳一中土大货船，势将危殆，火船驶近，盗舟四散窜逃，其货船上人，苦求火轮船主援助，乃用长缆牵之驶行，自寅至辰之久，货船人极感激，其船乃潮州装贩米粮者。”[78]

对于清政府“委之外国代除残暴”的做法，时人即已提出质疑：

近日海上盗贼蜂起，不可胜数，此皆因官府无制，遂使群盗劫掠海岸。既已失察于前，复不剿捕于后，得毋谓外国与中国，既通贸易，而遂委之外国代除残暴也耶，诚可怪也。夫中国须当怀柔远人，今乃反其道而求之远人，此似难解。[79]

事实上，清政府对海盗的放任行为，不仅仅把主权拱手相让，也进一步加大了中国沿岸航行的成本。即那些剿捕海盗的殖民者，通过护航、注册中国船只等手段，成为事实上的“洋海盗”，变本加厉地劫掠中国民众的商业利益。

三、彼岸：居人屋檐下

《遐迩贯珍》对域外的关注，范围宽广(参见表1)，但与中国本土联系紧密的国家并不多，成为华人移民目的地的国家就更少，集中分布于南洋、新旧金山和秘鲁等国。华人在这些移民目的地生活的时间长短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客居者。

(1) 南洋

东南亚和南亚是中国人下南洋的目的地。

至19世纪中期，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华人已有一定的规模，华人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遐迩贯珍》载：

> 加拉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有一地名万打拉度，有中土人等起衅滋事，不受地方官约束，旋为荷兰官兵驰往弹压，旋经平息，逼令中土人等皆列跪门外，抵首认罪，自言不敢仍前为非云。[80]

在这样的报导中，读不出土客之间谁是谁非，但由“逼令中土人等皆列跪门外，抵首认罪”来看，屈服的还是华人，原住民势力还是强于客居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移民南洋的同时，也把乡族械斗的传统带到移民地。而械斗一旦发生，就被当地原住民所利用，乘机转变为攻击华人、抢夺财产、焚毁店铺的“排华”行为：

> 新加坡地有福、潮人在彼起弁闹事。其构祸之初，原为小事启争，升斗之数不满，继而两家党与相嗾，构成其祸，刀械大举。月之初十日，街衢市肆，骚然不宁，奸宄乘乱，纷纷入人家抢搜财物。驻防英官兵，出而弹压，稍微敛戢。晚间哗然复起。十一日鼓众依旧扰乱，十二日仍然如故。英官弁恐夜间有匪徒乘机肆劫，戕害延烧，在在堪虞，乃严饬弁兵，彻夜巡查防御，以备不测，闾阎始安，未几旋就安贴。然遭毙者已四百八十人，伤者二百二十二人，获其监禁五百一十二人，烧毁房屋二百八十间，残踏花园一百六十间，抢劫铺户五十三间，此事亦非小故也。[81]

表1 《遐迩贯珍》对海外各地的关注度排序

地　　名	关注度	
花旗/花旗国/美国/合众国/合郡国/华盛顿/旧金山/金山/三佛兰息士哥/三佛兰锡士哥/三佛兰锡士歌	62+56+7+14+9+7+15+42+2+1+2	217
大英国/不列颠/英伦/英国/英邦/伦敦/苏格兰	6+9+15+81+2+24+5	142
日本/日本国/横滨/那霸/箱馆/下田	59+13+9+5+10+19	115
俄国/俄罗斯/西巴士多卜鲁/西巴士多卜鲁克/西巴士多卜城/西巴士多卜实（塞瓦斯托波尔)	46+30+7+1+17+1	102
佛郎西/佛廊西/佛兰西/佛郎西国/佛兰西国/佛国	14+4+16+11+7+22	74
天竺/印度/加尔各得/西印度/孟买	4+46+8+5+8	71
以大利/以大里/以大哩/以大理/以大理国/噫大哩/罗马/罗马城/罗马国	7+2+2+1+1+1+27+1+2	44
土耳其/土耳其国/拂林/拂林国	21+9+8+2	40
澳大利/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州/澳大利亚洲/新金山/墨儿奔/悉尼/悉泥	8+6+1+1+11+3+2+2	34
新加坡/新加波/新嘉坡/新嘉波/息力	2+9+7+1+7	26
小吕宋/小吕宋岛/吕宋	12+2+5	19
暹罗/暹罗国（泰国)	16+3	19
秘鲁/秘鲁国/真查洲	5+7+5	17
西班牙/大吕宋	10+7	17
哥罗美/哥罗美地	7+9	16
葡萄牙/葡国/葡萄牙城/葡萄牙国	7+2+1+3	13
荷兰/荷兰国	6+6	12
葛剌巴/葛罗巴/葛剌巴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6+3+1	10

资料来源：据《遐迩贯珍：人名•地名索引》沈国威先生的词频统计资料制作。

《遐迩贯珍•近日杂报》在论及中、西移民的差异时说：“惟西邦人出行者，与中土人登程，向不相同。西邦人俱挈眷而行，中土人多孑身遗家言迈，于理既属不宜，于事更形不便。”[82]因此，即使是在中国民众的传统移民目的地)))南洋，也是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以至于个别女性移民的到来，都成为新闻事件:

> 槟榔屿即新埠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闻纸，内云，有中土船八只进口，载到佣工人等九百七十四名，内有妇女数口，前者厦门匪党脱窜至彼地者，亦携有妇女。据来纸云，妇女至者，亦可资其材力为用，惜至者尚稀耳。[8]

在土、客融合比较困难的移民目的地，性别平衡是保证移民定居的社会基础。

(2) 南美

相对于南洋这样移民熟知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东岸的秘鲁，对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陌生的。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为世界12大矿产国，也一度是华工淘金的去处，但在19世纪中期，华工被诳诈之徒欺骗至真查洲挖鸟粪。真查洲，即位于秘鲁西南地区的钦查群岛(Chincha)。5遐迩贯珍6 1854年第10号载:

> 前者黄埔香港等处，有船载华民往真查洲，即海鸟粪洲是也。在华民初意亦以为往彼雇工，不料近闻华民在彼处，受人掣肘，如仆役然。夫照英国例，役人为仆，禁遏最严，兹公使大臣包令曾痛谕各英人，不得以延请雇工为名，复载华民往彼处。[9]

港英政府在禁止英人以延请雇工为名骗诱华民往此处的同时，还致书秘鲁政府与之交涉:

> 更有大堪痛恨者，华夏之民，向来被诡诈之徒，诱往南亚墨里迦之真查洲佣工，作掘鸟粪之役。始则蜜语甜言，引人入套。讵意抵埠之后，终日流汗，不得小休，甚至加以鞭挞，视若犬马，竟将先前所立之约，付作闲文。适有英国船主数人，目击其状，因思此等工人，背井离乡，远来化外州岛，既竭筋骨之劳，复受鞭挞之苦，乃动恻隐悲痛之心，沥情上诉英宪，恳乞设法，以悉除秘鲁国刁风。于是英宪乃致书秘鲁官宪，请勿纵民行暴，欺凌工人，若此庶无隙怨云云。[8]

在港英政府的交涉下，此事有了结果:/惟今秘鲁已书达英国大宪，言及该处，苛情悉革云云0。[$]

(3) 大洋洲

185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发现大量金矿，/亚士得里亚(Australia)地方产金，以癸丑年计之，所采之金，共计值价银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七百八十二磅。闻现有新矿，所产之金尤旺0，[$]华人因此称澳大利亚为新金山，这为四出佣工的中国民众提供了新的海外就业机会。/亚士得利亚墨儿奔信来云，有船二号，一名哥奴瓦，一名和李的马装载中土人，与四月初七日驶抵其地0。[$]大量的中国民众涌向澳大利亚，航运安全问题就显得异常严峻:

> 现在华夏之人，往加拉宽、奥士大利亚二金山采金者甚众，而英国未尝不视若子女然。迩者，中原乱作，盗贼公行，或掠民物，或火民居，遂致硕鼠兴歌，难安故土，故欲采金者愈众，往金山者愈多，此正货船者之所以藉以为利，而千古一时者也。乃竟乘此机会，以肆其狼贪，特赁破旧之船，载客过额，即所托船主，亦不选择，以致扬帆不日，船内搭客，或有染病身亡，总总弊端，不胜枚举，更或全舟覆灭，众竟为渔，即间有偶尔逃生，依于海石之上，亦不免日受冻馁，方能得救。凡此船主，既或侥幸抵达埠，亦不过藉风顺波平，上天庇佑而已，嗟嗟以钱财为性命，视人命若草芥，几何不人其面而禽兽其心也哉。[S]

历尽艰辛，泛海而来的华人，却很难在澳大利亚靠岸登陆。1855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颁布了限制华人船只入港的5为某些入境移民作出规定6的法案，其第三条略曰:

> 凡船运载唐客至本省各埠者，连船主伙长水手搭客，其人数不得出每十吨位一人之外，如有额多载，则按所载数多之数，每一人罚该船主英银十磅以下。第四条意见云，凡船运载唐客至本省诸埠者，船主必代每客输纳例银十磅，然后其客始得上岸，如有隐匿客数，或未纳例银之先，私令搭客登岸，官府察知，必严追例银，更罚该船主，照所隐匿或私放之客多寡，每一人罚银二十磅或减些。以上二

> 条，至本年唐九月二十二日始行。[u]

/例银0 又称 /医生银0。/果如是者，船主将何以处之，过额每名交银二十磅，不过额，每名亦抽收医生银十磅，船主岂肯代支此银，既不肯代支，其将搭客除交水脚外，每人另备办银二十磅之数，以为代交之资乎，或则船主，只得将搭客载往别处，不到咪厘邦一埠而已0。[v]例银的征收，其目的就是运用经济手段限制中国民众入境。

(4) 北美洲

1848 年旧金山发现了金矿。至 1854 年，漂洋过海到达美国旧金山淘金的人数已相当可观，/三佛兰息士歌（San Francisco）近有信来云，彼处现下统计中土人数，共有二万五千余名0。[w]然而 /该处中国旅客，现今甚是不安。被花旗人屡次驱逐，不得采金。又被其列于黑色阿非里加人及亚梦裹迦土人一流，不得于衙门作证等事0[x]，更为重要的是，该省总督，禁止唐人以后来此埠，增收唐客饷银等。[y]闻知此事，旧金山埠中国客商会馆，立即将华人事情辨明，翻译为英文，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这篇公启，道出了华人与美国人之间发生龃龉的方方面面，也描述了 19 世纪中叶海外华人移民社会的基本状况，很有代表性：

> 读前谕云，华人至本埠者，甚多。乃独自孤身而来不携家眷，盖中国良家妇女，缘多裹足深闺，不惯风波，甚难携家远涉重洋，而今亦有来者，非尽无也。又因屡有禁止华人来此之令，故各怀疑，未能安心携眷而来。若谓只驱采金之人，不禁服贾之辈，盖华客所带货物，多藉华人所消，若无采金者，贩货何为，是唇齿相依，不能缺一者也。
>
> 又云华人识话，及识规矩事例者甚稀，又不甚与来往。盖华人若昔日在故乡与贵国通商者，始通言语而悉规矩，若各处乡人到此，多言语不通，故情意似隔，心欲言而词不达，齿欲启而机不投，彼此毋怪其然。
>
> 盖中国货物，到来者不少，或各国客人运来，或华客自贩，互相贸易，累万盈千。至采金于山，佣工于市，皆遵规矩。如云游手之徒，聚于一处，赌博为生。盖聚赌窝娼，中国例禁，罪有明条。盖商等亦皆贱之，第无官守之责，不能驱逐，屡欲阻止，法无可施。既贵国例禁綦严，望祈亟将娼寮赌馆，概行禁止。俾得贱者从良，博者改业，勿令吏胥舞弊，而中正雍熙之世，指日可待。使同人安分营生，商等厚望焉。
>
> 华人来此省者，欲获财帛耳，稍遂其愿，即回国矣，，自始迄今，计中国载来货物及船费，总计入不抵支，多有资本全空，更被群小侮弄。在山内受尽明谋暗害，毙命劫财，车夫索勒，艇户强横，惨不堪言，，乃近日贵省新例，竟议我华人同烟贱（Indian）黑夷，官门不准作证。

要言之，华人独身前往，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极为不人性和不稳定的因素。加之语言不通，缺乏交往，乱冲乱闯，不懂规矩，聚赌窝娼，只能干采金这样的体力活，因此，华人被人认为是跟黑奴一样的下等人，被洋人大加限制。而清政对此却视而不见，以至于在华传教士都发出如下诘问：

> 然余更有怪者，凡诸国之人，如有在异邦，被人凌遏者，本国君上，定必行文该处有司，叩其原由，力为申理。今据录内所载，唐人如此受屈，而大清皇帝竟若置之度外，曾未闻有只字相加，关心究问，诚可怪矣！[z]

四、中国民众海上艰难时世形成的原因

面对中国民众艰难的海上生活，不仅传教士对此诘问不断，国人亦有同样的责问：

> 昔有贩阿州黑人为奴者，英国集商禁止，出资赎释。堂堂天朝，果能自庇其民，仿英人赎黑人之例，是诚出水火而衽席之也。然而言之非艰，行之维艰。积习难返，巨款何筹？视溺而不援，天下无此忍者；从井以相救，天下又无此仁人。是不过徒托空言而不能见诸事实也。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其实，19 世纪中叶，中国民众海上生活艰难，是由晚清巨大的人口压力，动荡的国内

环境，清政府所执行的海外移民政策，华人移民的基层组织)))会馆，华人移民自身的社会问题，以及西方种族主义等共同造成的，清政府不能及时救助，只是诸多问题之一。

首先，从国家制度来看，海外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弃民，自然对其/无可悯惜0。

清初于华人出洋，禁令甚严。顺治四年(1647)颁行的5大清律集解附例6云：

> 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t]

至雍正十二年(1734)，亦严禁华人偷渡出洋，并制定了依据拿获或疏纵人员数量等的定量奖惩措施。对于那些越规出洋者的态度，则如雍正帝所言：/朕思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0[t]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康熙五十六年定例，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其五十六年以后私去者，不得徇纵入口。0[t]乾隆五年(1740)修订的5大清律例6亦云：

> 在番居住闽人，实系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者，令各船户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交地方官给伊亲族领回，取具保结存案。如在番回籍之人，查有捏混顶冒，显非善良者，充发烟瘴地方。至定例之后，仍有托故不归，复偷渡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请旨正法。[b0]

至乾隆十九年(1754)这一限令有所松动，因为地方官员觉察到/出洋贸易之人，皆挟赀求利，素非为匪，且内地各有妻孥产业，原未肯轻弃家乡，只因海洋商贸通信靡常，账目取讨非易，又或疾病难归，栖身番地，或在船充当舵水，遭风流落，凡此皆系欲归不得，初非有意淹留0，因此对三年限期酌情进行了调整：

> 况一概定以三年之限，奸匪良民，无所区别，于查禁奸宄之道，未为周妥，臣等细加筹酌，应请交与各该督抚等，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份久近，概准回籍。[b0]

可见这次政策调整使海外华人归国的条件宽松了许多，但前提条件是归国者务必是合法的出入境人员，即能够出具/保结0的商人，/若奸匪之徒，或潜迹外番，供其役使，或漂流无赖，复图就食内地0者，/未可以不准回籍0，但却在/严行查禁0之列，其实还是不准回籍。至十九世纪中叶其情况亦如从前，如一位移民所述：

> 我们害怕中国官吏的检查，他们手下员司的压迫和自家族人和邻居的虐待。在我们回到中国时，我们会被诬控为盗贼和海盗，被诬控为夷人的暗探，为奴隶的购买者和拐骗者。很多人长年的积蓄被盗窃了，另一些人，家里房屋被拆毁，而且禁止他们重建新房；更有些人被迫要偿还伪造的借据。我们孤立无援，亲戚们视我们如路人。我们四面八方被贼人所包围，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能指靠谁的帮助呢？[bv]

因此，从国家制度来看，只要走出国门，就是/自弃王化0，非大清子民。因此政府考虑更多的是，还要不要让这些海外移民回来，遑论对其救助。

其次，客居的华侨，因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不仅自己无法在海外落地生根，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使华洋之间严重对立。

但是，越洋移民心中却根本没有/自弃王化0的概念。原因是中国人从来不携带家眷出洋。据报告，出洋去到东印度公司属下海峡殖民地的中国人，每年多达五千人。但是这些人全是单身男子，/本世纪内只有一个中国妇女到过那里。0由于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这些人想要在异国他乡成家立业，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在白种人为主的美洲和大洋洲，因此回家与妻子团聚、生育子嗣就是必然的选择。/东印度群岛各地的华人经常回国省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与妻子团聚，生育子嗣，留在本乡传宗接代。我相信出洋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抱着返回故乡希望的0。[bx]

中国移民的这种目标，把中国人同作为永久定居者而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其它移民区别开来。从中国到美国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侨居者，即侨民。他们一开始同美国人发生的

冲突，同以后所有新来的中国人同美国人的冲突如出一辙。可见这种无法落地生根的单性移民特点，影响了美国对中国人的接纳。[b] 同时，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嫖娼、赌博、酗酒等。/因唐人运载娼妓甚众，赌博匪徒成群，扰乱埠中，时常争闹0 等，加利福尼亚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来约束，5旧金山禁止赌钱新例6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颁布的。这样的社会问题，也成为英国人限制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口实。/闻新金山近日有唐人到埠，携有淫画，沿街求售。英人一见，大不喜欢，以为唐人携带此等物到来，将来坏人心术正自不鲜，欲禁止唐人，嗣后不准到埠0。[b]

第三，客居华人所采用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与西方市民法制社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制度性冲突。出国的华人，在国家基层社会制度缺失时，不约而同的把本土的民间基层社会组织)))会馆、家族、乡族、会党等，移植到海外华人社会之中。/会馆就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摹本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为众会员提供各种可能的便利，他能满足同乡在外籍寻求乡情依托的需要，能使同乡人走向仕途、商场时，不仅凭个人的奋斗，更能依恃团体的资助，因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0。[b] 但这种摹本于宗族社会的组织，常常/凝成一个闭锁的、自足的经济单位0，[b]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这些会馆和堂，打着慈善的招牌，背地里对其本国同胞进行监督和压迫。商人)))债主们借助地方会馆和族会控制着广大的契约移民。大多数中国侨民，在多方控制下，由于他们对乡土和家庭尽忠尽孝而被迫服从，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限制和命令。[b] 这种与周围社会隔绝的会馆组织，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市民法制社会，其宗族专制的落后性，是非常突出的。因此，当会馆制度在美国西部的/矿工营地0 一经出现，便被西方世界视为异端，冲突就不可避免。

长期存在的西方种族主义和中西宗教差异，进一步激化了华洋之间的冲突。常见的这种论调是，美国属于那些在/自由白人0 法律中成长起来的人，亚洲居民是/无获得公民权资格的外来人0，/不信神的人是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0。[b]

以上制度和社会问题，使得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举步维艰，也使得大量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华人飘落海外，成为雇主们掠夺的劳动力，甚至成为驱赶和屠杀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付出生命和血汗的中国民众，却没法在大洋彼岸赢得本应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这一点与欧洲各国移民在政府扶持下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X 本文为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明清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与基层社会应对机制研究0 (2007B052) 阶段成果之一。本文初稿完成后，复旦大学的周振鹤教授、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副研究员、中原工学院的王毅副教授、浙江大学的杨雨蕾副教授审阅全文并提出修改意见，谨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¹ 5遐迩贯珍6 1853年第1号，页1b)2b。文中所引5遐迩贯珍6 资料，皆出自松浦章、内田 市、沈国威编著的5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6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一书。

º 5遐迩贯珍6 1853年第1号，页4a。

» 5遐迩贯珍6 1853年第1号，页3a。

¼ 5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6，页15。

½ 施美夫(George Smith) 著，温时幸译：5五口通商城市游记6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页112，页228，页382，页302，页15，页403)405，页403。

¾ 熊月之、周武：5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6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页56，页61。

¿ 5遐迩贯珍6 1853年第3号，页9b。

À 丁韪良(W. A. P. Martin) 著，周振鹤主编，沈弘等译：5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6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86，页7。

Á 在上海小刀会战争中，法国人与英美所持的态度大为不同。如5遐迩贯珍6 1855年第3号载：/去年腊月二十日，黎明时，有官兵数千攻城，佛兵亦发大炮相助，斯时贼匪难近城隅，被官兵得据附城屋宇一间，其屋高与城齐，官兵即登屋上，放炮击城中。二十四日，红头开东门往攻官兵炮台，奋其锐气，亦不能取胜。当交仗时，城中有一民人，乘间出城，据

云，城内贼军只有一月之粮，而民间则皆室如悬罄，故猫犬虫类，搜杀殆尽，凄凉景况，难以尽言云云。0 1855 年 2 月 第 2 号亦有法国军队攻打小刀会的记载。可见法国人还是支持官军的。

Â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3#4 号，页 15a。

ⅴ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3#4 号，页 14a) 15b。

ⅵ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2 号，页 9a。

ⅹ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0 号，页 2a) 3b。

ỵ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9 号，页 9a。

ẕ 5遐迩贯珍6，1853 年第 5 号，页 10a。

ɩ{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2 号，页 17a) b。

ĩ 军机处 5上谕档6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m 军机处 5录副奏折6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雷以诚奏折。

m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 号，页 10a。

m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7 号，页 7b。

m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2 号，页 7b) 8a。

m 关于这次金融风潮，可参阅傅衣凌 5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摘录6，载 5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 (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页 255) 275。

m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8 号，页 11b。

m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9 号，页 10b。

m 5筹办夷务始末6 (道光朝) 卷 41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 年)，页 26。

m̃ 阿英，5鸦片战争文学集6 上册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年)，页 56。

n 5遐迩贯珍6，1853 年第 1 号，页 7a。

n 光绪 5马巷厅志6 附录，黄家鼎 5小刀会纪略6，光绪十九年重刊本。

n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5 号，页 9a。

n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2 号，页 8a。

n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1 号，页 9a) b。

n 戴一峰：5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6 (长沙：岳麓书店，2004 年)，页 311。

n 爱汉者 (Karl Friedrich August G tzlaff) 等编，黄时鉴整理：5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6 (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页 393 下。

n [美] 卫斐列著，顾均，江莉译：5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6，(周振鹤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出版社，2004 年)，页 121。

o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4 号，页 14b) 15a。

o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8 号，页 11a。

o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2 号，页 10b。

o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5 号，页 8a.。

o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8 号，页 6。

o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0 号，页 10a) b。

o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8 号，页 11b。

o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9 号，页 10a。

õ 5遐迩贯珍6 1856 年第 1 号，页 6b。

p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1 号，页 8b。

p [英] 佛兰克# 韦尔什 (Frank Welsh) 著，王皖强，黄亚红译：5香港史6 (A History of Hong Kong)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页 165。

p 1852 年 8 月 25 日 5驻广州领事埃姆斯雷致包令文6，载陈翰笙主编，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 第二辑 5英国议会档选译6 (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页 9。

p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4 号，页 12 b。

p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5 号，页 9a) b。

p 5香港史6，页 284。

p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5 号，页 8b) 9a。

p̃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 号，页 5b) 6a。

q 徐继 ：5瀛寰志略6 卷 2 5南洋各岛6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页 28。

q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1 号，页 8b。

q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4 号，页 14a。

q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1 号，页 8b) 9a。

q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4 号，页 10a。

q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2 号，页 11b) 12a。

q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3#4 号，页 8b。

q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0 号，页 11a) b。

q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12 号，页 14b) 15a。

q̃ [美] 马士 (Morse, Hosea Ballou 1855) 1834) 著，张文汇等译：5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6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页 454。

r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5 号，页 10b。

r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1 号，页 12b。

r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7 号，页 8b) 9a。

r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1 号，页 13a) 14b。

r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2 号，页 13b。

r 张集馨：5道咸宦海见闻录6 (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页 63。

r 5遐迩贯珍6 1853 年第 1 号，页 13a。

r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 号，页 10b。

r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7 号，页 7a。

r̃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1 号，页 12b) 13a。

s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9 号，页 8a。

s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6 号，页 11a) b。

s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 号，页 6b) 7a。

s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3#4 号，页 8a) b。

s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10 号，页 11a。

s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3 号，页 9a。

s 5遐迩贯珍6 1855 年第 3 号，页 9b) 10a。

s 5遐迩贯珍6 1854 年第 8 号，页 8b。

遐迩贯珍6 1854年第9号，页6b。

~s 5遐迩贯珍6 1855年第3号，页8b) 9a。

tu 5遐迩贯珍6 1855年第10号，页18b) 19a。

tv 5遐迩贯珍6 1856年第3号，页15b。

tw 5遐迩贯珍6 1854年第8号，页6a。

tx 1854年，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裁决，禁止有色人种出庭作证反对白种公民。

ty 5遐迩贯珍6 1853年第1号5花旗国金山汉人采金条规6：/第一条：自立新例之始，除本国人及烟阵(即土人，Indian)，暨已经入籍之汉人外，俱无庸领采金礼臣(license，即执照)任其开采。倘外路客民等，如无领给礼臣者，不准开采。第六条：发给礼臣纸，按月每名应纳税银四元，以一个月为期，期内不准将此纸转借给别人冒用。0 (页1b) 5遐迩贯珍6 1855年第8号5旧金山新设条例增收唐客饷银论6：/5东涯新录6 三月十九日载云，向来唐人，凡在山内取金者，现每名每月，征收礼臣纸银四员，兹本省议律官新定章程，自英本年十月初一日，即唐本年八月廿二日起，每月每名加收礼臣纸银二员，共六员，倘若下年，又照计二员加收云。0 (页16a)

tz 5遐迩贯珍6 1855年第5号，页15b) 18a。

t{ 彭玉麟：5海国公余辑录6 卷30 5禁贩奴论6，载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 第四辑 5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6，页2。

t| 5大清律集解附例6 卷15 5兵律#关津6，清乾隆刻本影印，5续修四库全书#史部6 第8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61。

t} 光绪5大清会典事例6 卷623 5雍正十二年谕旨：严禁华人偷渡出洋6，载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 第1辑 5中国官方文书选集6，页2) 3。

t~ 5清朝文献通考6 卷33 5市籴6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5159下。

ka 田涛、郑秦点校：5大清律例6 卷20 5兵律#关津6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页341。

kb 5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6 道光戊戌年七月5迁外国之民6 录5两广总督杨广东抚院鹤奏出洋贸易之留番地良民请概准其回籍折6，页393。

kc [德] 哥德瓦特：5中国海外移民对其他黄种和白种人的影响6，不来梅，1903年版，第7页。转引自陈达：5中国移民6，载5华工出国史料6 第四辑 5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6，页11。

kd 5厦门领事馆第一帮办温澈斯特博士关于移民出洋问题的笔记6，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 第二辑 5英国议会档选译6，页15。

ke [美] 贡特#巴特：5苦力：1850年)1870年美国华工史6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4.)，载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 第七辑 5美国与加拿大华工6，页75，页106。

kf 5遐迩贯珍6 1855年第8号，页17a。

kg 王日根：5明清时期/行0 的衰微与会馆的勃兴6，载氏著5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6 (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页321。

kh 傅衣凌：5论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6，5厦门大学学报6 1961年第3期，又载氏著5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 (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91。

ki 伊莎白拉#勃莱克：5美国劳工与中国移民6，载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 第七辑 5美国和加拿大华工6，页199) 201。